

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研究

——以广西为例

张强,周家金,孙庆彬,何祥海

(玉林师范学院体育健康学院,广西玉林537000)

摘要:依据文化学、协同学理论,从界定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入手,研究构建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是指从体育的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其创新路径有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的协同创新。研究提出物质层协同共建、制度层协同共建、精神层协同共建的基本方略,构建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共建共治共享”创新模式,以供各少数民族地区参考。

关键词:协同发展;创新模式;多元体育文化;少数民族地区;广西

中图分类号:G 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22)03-0028-05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Model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sports Culture in Minority Areas——Take Guangxi as an Example

ZHANG Qiang, ZHOU Jia-jin, SUN Qing-bin, HE Xiang-hai

(School of Sports and Health,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537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ism and Synergetic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defining the innovative model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multisports culture in minority areas, and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novative model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multisports culture in Guangxi,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inority area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innovation model of multisports cultur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rom the physical, institutional and spiritual levels. The innovation path includes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t the physical, institutional and spiritual levels. The basic strategies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t the physical level, 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co-construction and co-sharing at the spiritual level, and the innovative mode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co-sharing”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sports culture in Guangxi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novation model; multisports culture; minority area; Guangxi

协同发展即协调与同步发展,共存共荣^[1]。在文化多元化和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整个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目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各民族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学校体育等多种体育文化形态,正逐渐由多元非均衡发展向多元协同发展转变。各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体育协调发展上来,开拓创新,为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

建设做出应有贡献。但是在协调发展进程中,仍旧存在因发展动力需求不足、协同程度低、目标理念不明、组织保障机制缺失等原因^[3],未能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可借鉴的协同发展创新模式。因此,本文尝试明晰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的内涵及创新路径,依据创新路径并结合已有发展基础与不足,提出构建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的基本方略,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更多关注

收稿日期:2021-01-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研究——以广西为例(18YJA890036)

第一作者简介:张强(1969—),男,广西博白人,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与实践,为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提供更多参考。

1 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的界定

1.1 本质内涵

当前学术界普遍按文化结构将文化划分为外、中、内三层:外层即物质层,泛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本身;中层即制度层,包括组织、制度等各种规范和体制;内层即精神层,是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内核,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等。^[4]根据协同学、文化学等理论和相关专家学者反馈意见,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是指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多种体育文化之间的协调与同步发展,共存共荣。”^[3]这是一种在国家、社会和自身文化发展需求导向下,各民族传统体育、现代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等多元体育文化之间,既独立又相互借力发挥协同效应,达到共存共荣目的的发展,其本质上是体育的物质条件、制度管理、精神观念等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因此,本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是指从体育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指导,突出“地方性、协调性、生活性”定位,充分挖掘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的各种资源和动力需求,以“有特色、有水平的生活体育文化”为总体目标,发展繁荣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

1.2 创新路径

可见,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离不开体育的物质条件、体制机制、价值精神等层面内容的深度协同,其创新路径包括三个层面或维度:一是体育文化的外层即物质层协同创新,体育物质层主要包括体育文化的体育项目、场地设施、服装用品等内容,多元体育文化物质层面协同发展创新路径是指在体育项目、场地设施、服装用品等体育物质条件方面进行的协同创新,这是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协同创新较容易;二是体育文化的中层即制度层协同创新,体育文化的制度层主要包括体育组织机构、法规政策、体制机制等内容,多元体育文化制度层面协同发展创新路径是指在体育体制、组织机构、法律政策等体育制度方面进行的协同创新,该层面连接物质和精神层面,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三是体育文化内层即精神层协同创新,体育文化的精

神层主要包括体育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理想精神等内容,精神层面协同创新路径是指在体育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理想精神等精神方面进行的协同创新。精神层是体育文化的内核,是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最难协同创新发展的层面。

2 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创新模式的构建

2.1 现有基础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综合国力的提升,1995年“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以中国体育法的形式得以确立。而新时代的到来,使国家、社会、个体对体育的需求再升级,中国体育事业进入“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协同发展转型期,“国家体育总局把体育文化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5],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广西又称八桂,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散居于全区的14个地市。自国家“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方针确立以来,经多方努力探索,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有了一定的进展,现有模式打下的基础有:一是区市县体育管理部门体育工作的重心已进行调整,不再只重视竞技体育,而是多种体育并重;二是各种体育组织、协会、团体增多,举办的各类体育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多元体育文化的社会经济效益逐渐增强;三是同一类型体育文化发展势头向好,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类的民俗表演走向复兴、民族竞技走进赛场、民族健身走近大众等;四是大型赛事或节庆活动成功融入多种体育文化,既有近三届广西区运会、民运会、学生运动会整合了不同类型的体育项目比赛,又有每年三月三期间举办的“最炫体育风”节庆体育文化在全区各地或集中或分散的展演。

2.2 不足与成因

但从体育文化的多元一体整体发展水平来看,目前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协同程度较低,强弱势明显:一是在同一或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中竞技体育文化较强势,特别是以“灵、小、水”为主的现代优势竞技体育文化,区市县三级训练体系齐全,在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都得到广西各级政府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强力支持,无论在物质、制度还是精神层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二是在同一或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体育文化中,城市对比乡村发展较好,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区相对比河池、百色、崇左等地区发展较好。本课题组调研发现,目前

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呈一体共存的非均衡协同发展动态。如图 1 所示,正五边形为多元体育文化均衡协同发展的最理想状态,不规则五边形为动态变化的非均衡协同常态,各主要体育文化形态既有独立结构、功能和参与人群,又有交叉重叠和交互参与人口,支持力度和发展势头不一而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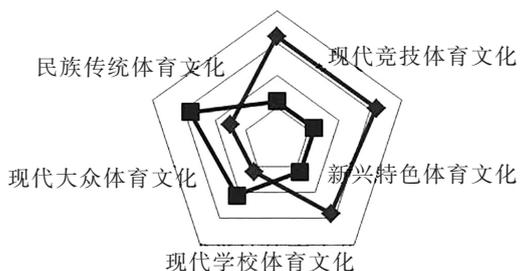


图 1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动态模型图

从体育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来看,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的基础还不坚实,不均衡、不协同的问题普遍存在:从物质层面看,同一或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体育文化发展,在体育场地设施等物质环境条件方面协同共建共用太少;从制度层面看,同一或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体育文化发展,在体育组织机构、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层面协同共建共治不足,缺少一套系统有效的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治理制度;从精神层面看,同一或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体育文化发展,在体育价值观念、理想精神层面的协同共建共享有所缺失。

究其原因,这种状况既有经济、政策等外在因素影响,又有民族地区人文历史等内在因素制约,但主要还是受举国体制下“竞技优先”发展模式的长期影响,导致贯彻“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和创新落实等各种规划、政策的不到位。政府尚未从管理体育发展的“竞技优先”惯性思维中走出来,政府职能尚未切实转变为“放管服”,所以顾此失彼,社会力量又缺少关注或难以参与、投入等等。因此,如何发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举国体制”作用,开启新发展模式,“促进其均衡、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6]

2.3 “共建共治共享”创新模式构建方略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关于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指示,大力推进体育强国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转型。根据协同发展创新路径并结合现有基础,在“一体化规

划协同推进”原则下,笔者提出“三层协同共建”基本方略,强基础、扬优势、补不足,构建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协调发展“共建共治共享”创新模式。

2.3.1 物质层协同共建

作为外层的物质条件的发展提升是体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物质层的协同共建,能有效降低体育文化建设成本,高效汇聚体育资源,提升体育场地设施、体育服饰用品等的利用率。按照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的外层协同创新路径,广西可构建物质层协同共建模式,统筹建设规划、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体育物质条件,突出物质层面共建共用的价值:

一是体育基础设施协同共建。这是提升体育文化物质层协同发展水平的基础。首先要抓好区市县三级的大、中型体育中心的改建扩建,在选址、设计和建筑上,既要考虑“标准化”,又要充分考虑“民族化”“大众化”“生活化”,多方征求意见加强论证,减少土地、经费浪费或重复建设,以满足民族传统体育、现代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等正规赛事及常规体育活动的多种使用需求。其次是各企事业单位、城市社区、学校、乡村体育活动站点的共建共用,要充分利用空地、房屋、绿化地、屋顶等,兼容建设小型化、多样化、生活化的场地设施等,以满足人们的多元体育健身生活需要。

二是体育项目数字化展演平台的协同共建。以广西“三月三·最炫体育风”节庆体育盛会展演为基础,整合区运会、民运会、学生运动会不同类型体育项目比赛,构建“八桂体育风”大平台,形成区市县三级可链接的数字化展播平台,便于全年实时更新全区同一或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各种体育项目发展情况,以满足数字化时代人们的体育视听需求。

三是民族体育产业市场的协同共建,做大做强八桂体育文化产业。广西少数民族以壮族为主,壮、瑶、苗、侗、仫佬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民族古村落众多,保存完整,风景独特。民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丰富,市场可开发的价值高,包括民族体育器械、服饰产业、民族特色体育旅游业、表演业等,都是大有市场的民族地区体育产业,投资开发后可做大做强八桂体育文化产业以反哺体育。

2.3.2 制度层协同共建

“文化强国需要文化治理和文化追责制度共建”。^[7]制度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体制制度,如各级行政管理组织设置、责权、运行机制等;二是具体制度,

如法律、政策、措施等^[8]。制度层面协同是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战略控制点,是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升级的关键。因此,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发展必须重视长效机制的协同共建,各地区应健全各级体育文化组织治理机构,完善政策法规机制,强化制度层面协同共建共治以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创造更多协同发展空间。

一是利用政府和社会力量健全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组织机构。首先是建立区市县三级政府体育文化管理机构并赋能,负责对全区各民族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全面统筹,这是民族省区内政府间纵、横向协同管理的主导力量,毕竟党和政府最有公信力;其次是成立各种政府间与民间体育协作的组织机构,本着平等交流、共情献策的宗旨进行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研究,如红水河流域体育文化发展合作组织、北部湾城市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八桂体育文化发展论坛组织等,这将会更具学术性、专业性、权威性;其三是制定《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公共管理组织条例》,使组织机构的议事和决策制度化,为以上组织机构的合法运转提供保障。

二是利用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完善一体化协同规划机制。广西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东盟战略及相关政策的享有者,这些战略政策主要包括增加资金投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内外开放、优引人才与发展科教等方面。据此,其一是建立专项资金投入制度,支持体育基础设施协同建设;其二是建立税收优惠制度,优化投资环境,对民族地区内外资体育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免部分企业所得税,促进民族地区体育市场发展;其三是完善对内外开放制度,推进各地区体育协作与对口支援帮扶,促进各类体育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其四是健全协同引才育才制度,增加教育投入,优化“体教融合”协同育才育才机制,为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三是利用监管奖惩手段健全协同监督激励机制。有效地监督评价并给予必要的奖励和追责惩戒,能激发各地协同发展的动力,促进协同发展目标达成。首先是建立区级联合督导机制,全面督导评估多元体育文化发展中涉及各类型体育发展的各种政策规划执行落实情况;其次是健全同一和不同类型体育文化之间协同发展水平的监管评估机制,会同体育、教育、民委、卫生等部门及第三方机构,加强本地各类体育文

化建设的指导、监督、评估。

2.3.3 精神层协同共建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管社会和个体的发展如何起起落落,体育的价值、精神一直在不断的创新中传承发展。因此,共创新时代八桂体育精神——广西多元体育文化普适共享的体育价值精神体系,是广西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的共同使命。新时代八桂体育精神应是根植于八桂大地,受世界体育和中国体育精神的影响,在各民族地区体育活动中表现出集健身康乐、爱国爱族、公平竞争、团结拼搏、开拓创新为一体的一整套体育精神体系。各地可充分发挥传统媒介和新媒体作用,线上线下共建和大力弘扬八桂体育精神。

一是健身康乐理念。“体育不仅是运动,更是一种健康生活”,这是人们进行任何体育文化活动都应有的观念,更是八桂体育文化要确立“强健体魄,健身康乐”的根本价值。二是爱国爱族情怀。八桂体育文化都应有并且通过活动激发和强化人们热爱祖国、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这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是生存、发展、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三是公平竞争意识。体育强调在平等条件下进行友好和平的竞争,这是八桂体育文化“为人们在社会或者其他领域下树立的一个独特而光辉的榜样”^[9]。四是团结拼搏精神。体育不仅需要英勇顽强、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更需要团队协作、团结拼搏精神。八桂体育应共同倡导团结拼搏精神,使之成为个体习惯、民族之魂。五是开拓创新精神。体育拓展了人们追求生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创新则是各种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灵魂。八桂体育应共同树立开拓创新的体育精神,以更大的胸襟互动学习、交流交融,使之成为重振广西体育雄风的主旋律。

3 结 语

过去说体育有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三驾马车,实际上现在的体育还应加上民族传统体育和新兴特色体育。这五驾马车在物质、制度、精神层面的协同发展共同承载着中国体育文化的未来,对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和体育强国、文化强国的建设意义重大。因此,在协同创新发展之路上,必须根据各地传统和客观实际,结合已有的基础发展新时代多元体育文化。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可在现有发展基础上,按照物质层协同共建共用、制度层协同共建共治、精神

层协同共建共享的基本方略,构建和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协同发展创新模式,提升本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水平,为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郭治安,沈小峰. 协同论[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1:223-228.
 [2]冯俊,白光斌. 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的协同发展研究[J]. 贵州民究,2019,40(5):141-144.
 [3]张强,周家金,唐远金. 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体育文化协同发展的动力需求探析[J]. 湖北体育科技,2020(11): 948-950.
 [4]翟继勇. 体育文明的现状与发展探索[M]. 北京:光明日报

出版社,2012:3-4.

[5]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 新中国体育文化宣传工作发展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2019(10):19-31.
 [6]董宏伟. 均衡与非均衡: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的理论模式与现实选择[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30(2): 8-11.
 [7]彭国强,高庆勇. 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美国体育产业的制度治理与启示[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4):10-17.
 [8]胡文臻. 文化强国需要文化治理和文化追责制度共建[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30(008).
 [9]刘艺芳,张志刚. 论中国体育精神涵养中国精神[J]. 体育文化导刊,2018(3):8-12.

[责任编辑 魏宁]

(上接第 18 页)

[13]章荣华,陈卫平,李娜,等. 浙江省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因素分析[J]. 中国学校卫生,2013,34(1):20-23.
 [14]李轶群,高霞,金建玲.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为现况调查分析[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0(5): 481-484.
 [15]周一,季成叶,张琳. 中国北方两城市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聚集模式分析[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05,14(8):740-741.
 [16]崔真真,黄晓春,何莲娜,等. 基于 POI 数据的城市生活便利度指数研究[J]. 地理信息世界,2016,23(3):27-33.
 [17]史志高. 上海互联网发展阶段研究(1994-2011)[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18]彭勃. 计算机网络对青少年学生成长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初探[J]. 中国农村教育,2018(12):80.
 [19]李晓巍,邹泓,金灿灿,等. 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与人格、家庭功能的关系[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2):54-59.
 [20]赵海,马迎华,庄丽丽,等. 中华预防医学会儿少卫生分会第九届学术交流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学校分会第三届学术交流会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2011.
 [21]齐凌云. 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存状况与政策思考[J]. 工会理论研究,2019(4):51-57.

[22]覃露. 随迁儿童家庭教养模式、自我概念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19.
 [23]梁丽霞,鹿森. 男女两性参与家庭教育的性别差异分析[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6):83-89.
 [24]董宏伟. 家庭社会资本对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的影响及反思[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29(2):33-37.
 [25]窦敏. 家庭背景对高中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影响的研究——以临汾市为例[D]. 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18.
 [26]BORTZ J,DOERING N. Forschungsmethoden und Evaluation für Human- und Sozialwissenschaftler (4. Auflage) [M]. Berlin;Springer,2005:683.
 [27]ATKIN A J,SHARP S J,CORDER K,et al.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screen time in youth: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2014,47 (6):803-807.
 [28]伍晓艳,陶舒曼,张诗晨,等. 中国 12 省份中小学生视屏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6,50 (6):508-513.
 [29]谭珺. 湖南省两县 876 名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知识、行为现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D]. 长沙:中南大学,2014.

[责任编辑 江国平]